

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研究^{*}

蒋 真

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是在伊朗反对君主专制、反帝反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并形成的。霍梅尼对伊斯兰教什叶派传统教义的创新，既体现了他对君主专制和政教关系的看法，也包括了他对教法学家社会地位的思考，以及未来国家治理机制的构思。霍梅尼关于建立伊斯兰政府、改革伊斯兰教育以及输出伊斯兰革命等思想，对伊朗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其在教育上的主张，对革命后初期伊朗的文化和科学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政治纲领，奠定了伊朗政教关系的基调，也给伊朗的未来发展带来了巨大争论。

关键词：霍梅尼 伊斯兰革命思想 教法学家 伊斯兰政府

作者：蒋真，1979年生，史学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霍梅尼作为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领袖，不仅是当代伊朗的立国之父，也对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对伊斯兰教什叶派传统教义的创新，不仅顺应了伊朗反对君主专制和反帝反殖的历史潮流，也是20世纪60、70年代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推翻君主专制、建立伊斯兰政府，作为霍梅尼革命思想的核心内容，引领着伊朗伊斯兰革命走向胜利，并最终建立了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伊斯兰政权，也为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教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

一、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出现的背景

霍梅尼于1902年9月出生于伊朗中央省霍梅恩的一个宗教家庭，从宗教青年成长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宗教领袖和政治领导人，他的成长伴随着大半个世纪以来伊朗国内国际环境的变迁。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的出现和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7年到1964年，霍梅尼开始从伊斯兰教传播者成长为坚定的反王权斗士；第二阶段是1964到1979年初，霍梅尼在流亡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伊斯兰理论体系，成为伊朗的革命导师；第三阶段是1979年到1989年，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思想得以全面实践。然而，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的出现有其深厚的背景，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改革，违背了伊朗国情，国内怨声四起。

巴列维王朝自建立以来，一直试图通过改革来中兴伊朗。除了1963年发起的白色革命，从1949到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先后经历了两个七年发展计划和三个五年发展计划。尤其是穆

^{*} 本文系本人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变动中的神权政治——当代伊朗政治改革与发展研究》（08XSS003）的阶段性成果。

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以来，随着石油繁荣的到来，政府加大了改革力度，巴列维的头脑也开始发热。1974年8月，在拉姆萨尔举行的关于修订第五个发展计划的会议上，巴列维提出“我们向你们许诺的‘伟大文明’并不是乌托邦，我们达到‘伟大文明’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快的多。我们说过我们将在12年内跨进它的门槛，而在有些方面我们已经进入‘伟大文明’的境界。”^①

伴随着农业改革的跨越式发展和工业改革的冒进，基于不触动大地主根本经济利益为前提的土地再分配并没有让农民受益，工人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中的分红也因腐败和物价飞涨而大大缩水。但从理论上来看，巴列维发起白色革命以及后来的现代化改革，目的是要改变旧有的生产关系，建立资本主义新经济。然而，他在政治领域拒绝任何实质性的民主改革，相反还强化王权在各个领域的控制，最终导致滞后的政治改革与急速先行的经济改革之间必然产生矛盾。为巩固统治，巴列维加强君主专制的举措之一是加强伊朗的军队和秘密警察建设。1963—1977年，伊朗军队人数从20万增至41万，1963—1973年，军费预算从不足3亿美元增至18亿美元，1977年高达73亿美元。1977年时的伊朗拥有波斯湾最强大的海军和中东最先进的空军，号称世界第五军事强国。^② 1953年，为控制社会舆论和监督人民的行为，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成立，由5000多名警察组成，成为“国王的耳目和铁拳”。萨瓦克成员遍布伊朗国内，其社会惩戒功能的滥用一度在伊朗社会引起恐慌。除此之外，为统一国内的政治气候，巴列维在1964年宣布废除两党制，国民党和民族党合并成新伊朗党；复兴党在1975年取代新伊朗党，成为伊朗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其任务是铲除背离官方的思想倾向，实现伊朗人民的思想统一，确保白色革命的顺利进行。然而，此时伊朗的君主专制看似稳固，事实上传统阶层的不满正不断地向社会上蔓延，街头抗议不断，乌勒玛的社会动员能力逐步体现，从而为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的出现与形成提供了历史条件。

2. 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改革侵害了宗教集团的利益。

从礼萨汗的世俗化改革到巴列维的西化改革，王权与宗教势力之间的斗争一直比较激烈，他们时而联合时而竞争。随着巴列维政权的巩固和进行资本主义现代化改革的需要，打击和削弱宗教势力成为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例如在礼萨汗时期，1926年在伊朗议会中宗教界的议员占总议员的40%，1936年宗教议员已所剩无几，1940年宗教势力已淡出议会。^③ 1928年和1935年，政府两次立法进行服装改革，强制男性戴“巴列维帽”和西式礼帽以取代传统头巾。1935年，还立法禁止妇女佩带面纱。1934年颁布“宗教地产法”，1935年的“行政法条例”规定教育部所属的宗教地产局有权接管那些无管理者或者管理者名气不大的宗教地产的事务；有权批准地产的经营预算和将宗教地产转为私产。1963年，巴列维倡导的白色革命开始，以土地改革为核心，他提出来森林牧场国有化、修改选举法给予男女平等选举权、以及成立农村扫盲队等主张。这一计划的推行，在推动伊朗政治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使伊朗的国家发展道路也越来越向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白色革命时期，土地改革规定宗教地产管理人必须与佃农签订为期99年的租佃协议，这些地区农民土改后每年交纳的地租额大为减少，宗教界人士的实际收入下降，从而试图削弱了他们在伊朗社会中的政治影响力。

① 张振国 《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4页。

②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435.

③ John Foran, *Fragile Resistanc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 Westview Press, 1993, p. 223.

然而,据 1966 年末伊朗第二次人口普查,伊朗有各种神职人员 1.25 万名,1973 年上升为 1.5 万名。另据《1974 年伊朗年鉴》数字,全国城市有清真寺 5400 座,其中德黑兰有 1000 座,库姆有 155 座,卡善有 97 座,中央省各城镇有 1500 座。此外,农村地区还有许多清真寺。这些清真寺既是神职人员讲经布道的场所,在有些情况下也是对什叶派穆斯林进行政治动员的场所。^①而且巴列维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伊朗所面临的问题,相反,改革导致了少数上层阶级和新兴中产阶级在不断西化,以农民和城市巴扎商人为主的广大民众阶级继续追随宗教领袖,按伊斯兰方式生活。这一状况为宗教团体与世俗王权的斗争创造了机会,也为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民意基础。。

3. 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的发展及其对什叶派教义的创新,适应了推翻巴列维王朝的需要。

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与反对巴列维专制统治的斗争进程联系在一起。从 1943 年霍梅尼《揭露秘密》一书的内容来看,此时霍梅尼思想的核心是为伊斯兰辩护,谴责政府的世俗化政策。霍梅尼表达了教士参政的强烈意向,但仅限于监督君权,以确保政府遵从神圣律法,没有排除与政府合作的可能性,他在王权面前仍处于一种防御姿态。20 世纪 60 年代初,随着白色革命的推进,霍梅尼对伊斯兰的维护不再是一种防御姿态,而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向巴列维政权发起进攻。此外,霍梅尼坚决反对美国势力在伊朗的存在,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维护伊朗的民族独立和传统文化。然而此时霍梅尼维护伊斯兰的反政府立场仍然只是针对政府的政策,并没有指向伊朗的政治体制和整个上层建筑,也没有明确的、替代性的伊斯兰方案。到了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霍梅尼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激进变化,由原先主张在君主立宪体制内乌里玛参政,转而号召推翻君主制,建立伊斯兰神权体制。霍梅尼思想的这一变化集中体现于《伊斯兰政府》一书,主张建立伊斯兰政府,指出要确保人类的幸福,仅仅有真主的法律是不够的,还需要法律的实施权和实施者。^②

这一思想的最终形成,不仅仅来自霍梅尼与巴列维王朝斗争经验的总结,霍梅尼对伊斯兰教什叶派教义的创新,为其思想的体系化以及后来的政治实践起到了奠基作用。20 世纪 60 年代初,伊朗什叶派的效法源泉布鲁杰迪去世,伊朗宗教界出现了分裂,以霍梅尼为首主张宗教干预政治的政治行动主义势力开始出现在伊朗政治舞台的中心。与西斯塔尼的什叶派静默主义主张不同,霍梅尼主张政治行动主义,鼓励教士们积极参政。首先,他发展了什叶派教义中“非伊玛目的统治不合法”的信条。指出君主制的不合法性,主张以一个教法学家政府取而代之,首次在什叶派历史上论证了在伊玛目复临之前,乌勒玛可以夺取世俗政权,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其二,他对教法学家所具有的权威作了重新解释,将其扩展到国家的治理。他说“治理国家是安拉的先知的绝对权威的一部分,它源于伊斯兰的基本制度。与其他制度,即使是礼拜、朝觐、斋戒相比,它具有优先权。”其三,在关于领导者资格的论述中,他提出伊斯兰政府的领导者应当具备两大条件:教法知识和公正。其四,霍梅尼泛化了什叶派思想,使之成为一切被压迫者的革命意识形态,为输出革命做准备。^③霍梅尼的思想不仅导致了国内反君主专制联盟的最终形成,为迎接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做好了最后的动员,也为后来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伊斯兰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和奠定了理论基础。

① 张振国 《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研究》,第 188—189 页。

② 陈安全 《霍梅尼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载《西亚非洲》,2007 年第 8 期,第 39—41 页。

③ 王宇洁 《伊朗伊斯兰教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27—129 页。

二、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的主要内容

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的形成是在与巴列维王朝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其内容既体现了霍梅尼对君主专制和政教关系的看法，也包括了他对宗教学家社会地位的思考，以及未来国家治理机制的构思。其主要内容包括：

1. 反对君主专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的首要内容之一即是反对巴列维的王权专制。1963年，霍梅尼在库姆开始向巴列维国王公开宣战，抨击巴列维政府独断专制、操纵选举、侵犯宪法、禁止新闻自由、取缔反对派政党和侵犯民众权力，谴责巴列维国王投靠美国、出卖伊朗的民族利益以及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和出卖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将巴列维国王比作杀害伊玛目侯赛因的哈里发叶齐德，号召什叶派穆斯林推翻巴列维王朝。霍梅尼甚至发出警告“如果国王任然任意妄为，那么当他某一天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人民将会感到无限的喜悦。”^①

随着巴列维的亲西方政策和西化改革的推进，西方文化与价值观汹涌而来，对伊朗的传统社会和文化造成了猛烈冲击，不仅给普通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带来不适，更遭到宗教阶层的强烈反对。霍梅尼指出，伊斯兰正经受着物质主义、基督教和犹太复国主义等邪恶思想的侵入，呼吁净化伊斯兰、回归伊斯兰教。霍梅尼认为，为了维护伊斯兰社会的团结，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府的占领和奴役，解放伊斯兰国家。为了穆斯林人民的团结和自由，穆斯林必须推翻由帝国主义扶持的压迫政府，建立服务于人民的公正的伊斯兰政府。为抵制外来世俗文化的入侵，1964年霍梅尼在批评议会授予美国公民外交豁免权时明确表示“过去，英国人奴役穆斯林国家；现在，这些国家处于美国的奴役之下”，“来自美国的大资产阶级涌入伊朗，以投资的名义奴役我们的人民……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剥削……另一方面说明现行的政府屈服于殖民主义……现行的政府力图毁灭伊斯兰教及其神圣的法律。因此，只有伊斯兰教和乌勒玛才能阻止殖民主义的侵犯。”^②

2. 建立伊斯兰政府、由教法学家治国。

对于教法学家历史和现实作用的评价，一直是霍梅尼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对在革命中起到领导作用的教士阶层在革命后将扮演什么角色，也是霍梅尼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最终汇集成《伊斯兰政府》一书，它是霍梅尼革命思想最为核心的内容，也是对未来伊朗政教关系的最终定位。

霍梅尼认为，伊斯兰政府在历史上是有先例可循的，先知时代在麦地那建立的穆斯林社团就是历史上首创的“伊斯兰政府”。因为“历史的过错”，这一正确、合法、得体的政治体制仅仅实行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被伍麦叶王朝的国王们用武力推翻，因此今天必须恢复这一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从伊斯兰教法角度来看，真主颁布伊斯兰教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国家政府，以便有效地管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③建立伊斯兰政府是社会进步的保障，可以防止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出现，保护社会免于腐败堕落。

霍梅尼认为，教法学家必须既是领袖又是统治者，执行法令和建立伊斯兰社会秩序。”但作为合法领袖的教法学家必须具备两大条件：精通沙里亚法和公正。”其教法学家统治的逻辑是：

① D. Hiro, *Holy Wars: The Rise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 159.

② John Foran, *Fragile Resistanc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 Westview Press, 1993, p. 368.

③ 吴云贵《当代伊斯兰教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4-216页。

伊斯兰社区的神圣监督权直接属于真主，然后是伊玛目，最后在伊玛目隐遁时期是教法学家，因此接受乌莱玛的宗教监督统治是每个穆斯林的宗教责任。在霍梅尼看来，教法学家“不仅仅是被看作建议和同意的分发器，而且是一个真正的权力实践者，他们是唯一有资格成为伊斯兰宗教政治秩序的仲裁者和统治者。”^①因此，宗教学者的权威被霍梅尼扩展到了一个过去从未涉及过的领域，即对国家的治理。也就是说，宗教学者不仅拥有宗教知识的权威和提供咨询的能力，还拥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②

霍梅尼声称，“我们需要的伊斯兰政府将是宪政的而不是专制的。伊斯兰政府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立宪政府即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制定法律。新的国家将严格遵循《古兰经》、‘圣训’和沙里亚所规定的原则”，“既然伊斯兰教的原则是法律的原则，那么只有教法学家而不是别人负有治理国家的使命。他们是理解先知意图的人和按照安拉的旨意管理社会的人”，“教法学家有权支配国家机构、传播公正、保障安全和调整社会关系。教法学家具有确保人民自由、独立和进步的知识。”“伊斯兰政府是法治的政府，安拉是唯一的统治者和立法者。”^③

3. 改革伊斯兰教育

对于教育，霍梅尼认为，对于那些阻碍社会变革，使人们得不到真正伊斯兰的假圣徒，必须清理出宗教学校；必须把那些用圣职来换取世俗享乐的宫廷教士的头衔取消，把他们从学校中驱逐出去。霍梅尼尤其告诫年轻人，肩负起建立伊斯兰政府的重任，抛弃心中的消沉和冷漠，改进宣传方法和计划，坚持不懈地去宣传伊斯兰。霍梅尼建议他们与军队和爱好自由的人民携手，充满必胜的信心，去推翻专制政府，建立伊斯兰政府，并借这一政府进一步指导人民。霍梅尼指出，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保障未来的生活，这是真主所禁止的，如果这样，他们永远也成不了法学家或伊斯兰的受托人。学习的目的应该像伊玛目时代的战士那样，准备做一个对伊斯兰有用的人，去传播伊斯兰的公正。^④

事实上，革命胜利后，霍梅尼也是这样做的。在霍梅尼的倡议下，政府开始调整教育体制、修改教学内容，伊朗部分高校在管理体制上与革命毛拉们控制的伊斯兰经学院建立起联系，大力贬低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弘扬伊斯兰文化观。1979 年 7 月 23 日，霍梅尼提出，“毒害我们青年的东西之一就是音乐，只需片刻，音乐就会让听者懒散迟钝……音乐和鸦片之间没有区别……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的电台电视台就应具有教育性，音乐就必须被排除。……演奏音乐就是对国家和青年的背叛行为。”^⑤ 1979 年 7 月 24 日，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宣布，根据伊玛目的教导，禁止广播音乐，惟有伊斯兰音乐和革命军乐允许播放。1979 年，政府关闭了全国 256 家电影院中的 180 家，而且这一时期，伊朗电影多为揭露巴列维王朝时期的道德败坏、经济依附、从属西方和政治压迫，宣传自我牺牲、殉道和革命忠心。1980 年 3 月 21 日，霍梅尼要求大学伊斯兰化。他说，“伊朗所有大学应服从于高尚的革命，所有与西方有联系的教授都应肃清，大学应成为学习伊斯兰科学的中心。”4 月 26 日，霍梅尼再次发表讲话“当我们谈起改革大学时，我们的意思是指我们的大学目前处于依赖他人的从属地位。它们是帝国主义的大学，它们所教育和训练的人迷恋西方。”^⑥ 1980 年 5 月，霍梅尼下令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该委

① Mehdi Moslem, *Factional Politics in Post-Khomeini Iran*.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3 - 14.

② 王宇洁 《教法学家的统治：历史渊源及历史困境》，载《世界宗教研究》，2002 年第 3 期，第 109 页。

③ 哈全安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19 - 320 页。

④ Khomeini, *Islam and Revolution*. London: KPI Limited, 1985, pp. 135 - 145.

⑤ 冀开运 《试论伊朗现代化过程的特点》，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1 期，第 116 页。

⑥ Ali Rahnama and Farhad Normani, *The Secular Miracle*, London and New Jersey, 1990, pp. 226 - 227.

员会在高校大规模清洗“非伊斯兰分子”。真主党、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出动开展了“清校”活动，关闭大学，查封研究所。

4. 输出伊斯兰革命

输出伊斯兰教革命是霍梅尼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霍梅尼认为伊斯兰不仅是革命的手段，也是革命的目的，伊斯兰不仅为伊朗服务，伊朗也应为伊斯兰服务。他认为，伊斯兰革命在伊朗成功以后，应以伊朗为根据地在全世界展开，在伊斯兰中不存在由边界划分的民族国家，因为伊斯兰大世界的人民拥有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法律——沙里亚，其主权属于真主。他主张泛伊斯兰主义，梦想建立“世界伊斯兰政府”，“将向世界各地输出我们的革命”，宣称“所有穆斯林都属于一个社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责任把伊朗的总政策置于各伊斯兰民族的联合和团结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① 1980年3月21日，伊朗新年时，霍梅尼说“我们必须努力输出我们的革命，我们应放弃不输出革命之想法……所有的超级大国及列强一定要让我们毁灭，如果我们停留在禁闭的环境中，我们将一定面临失败。”^②

为执行霍梅尼输出伊斯兰革命的主张，革命后的伊朗当局成立了“全球革命部”，联络和支持世界各地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运动。而伊朗的这一政策一度在伊斯兰世界引起恐慌，毕竟中东地区的国家大多是逊尼派国家，而伊朗输出的伊斯兰革命是什叶派的革命思想。也因此，在两伊战争中，中东多数国家持支持伊拉克的立场。

三、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的影响

正是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实现了伊朗社会各阶级的广泛联盟，指导着伊朗伊斯兰革命走向胜利。1979年革命后，为巩固伊斯兰革命成果，伊朗在国内实行全面伊斯兰化。与此同时，霍梅尼输出革命的思想及其实践，对中东地区的政教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期，席卷西亚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伊斯兰狂潮再次引起中东各国的担忧，其间，伊朗什叶派的伊斯兰政权与北非苏丹逊尼派的哈桑·图拉比政权遥相呼应。就影响来看，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对伊朗国内发展产生的影响最为重要。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其最大影响是伊朗将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政治纲领载入宪法，从而奠定了伊朗政教关系的基调，使未来伊朗的任何变革都逃脱不了伊斯兰的体制框架。

1979年伊斯兰革命留下的最大遗产是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治国理念，以及围绕法基赫建立的一系列权力机构，从而巩固了该体制在革命后的统治地位和控制能力。教法学家治国是伊朗政教合一政治体制的核心，也是人们将其称为神权国家的主要评判标准。该体制是承接于霍梅尼时期的个人魅力型领袖治理模式，后来通过1979年宪法将其体制化，成为伊朗政治制度的核心。它不仅为霍梅尼集宗教与政治权力于一身提供了政治基础，也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教关系确立了宪法基础。霍梅尼通过发布宗教法令的形式成立各种具有行政和立法性质的机构，对法律制定和执行进行干涉，通过在各司法机构设置个人代表来干预司法事务。霍梅尼“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战斗，战斗，直到最后胜利”和输出革命等口号及其在伊朗政治中的纲领性作用，很明显是对政府外交政策制定的干预。

革命胜利后，为巩固伊斯兰革命的成果，伊朗建立了一系列带有宗教色彩的革命机构，如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伊斯兰革命法庭、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斯兰基金会、宪法监护委员会、最高伊斯兰宣传委员会等机构。为统一政党观点，伊朗还建立了革命后的唯一合法政党——伊斯兰共和

① 唐宝才：《冷战后大国与海湾》，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218页。

② A li Rahnama and Farhad Nomani. *The Secular Miracle*. London and News Jersey, 1990, pp. 300-301.

党。另外还成立了情报组织和武装治安组织。1983 年,情报部成立,1984 年,打击违法治安巡逻队成立,他们每天在街上巡查,监督人们的行为。这些机构的建立在一定程将强大的伊斯兰因素带入了新的政治体制,从而使未来的任何政治经济改革都不可能超越伊斯兰体制框架的界限。尤其是宪法监护委员会和伊斯兰基金会的成立,对后来伊朗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宪法监护委员会作为一个超宪法机构,拥有很大的权力,其对议会和总统竞选候选人的资格审查,可以随时剔除不符合伊斯兰革命精神的人选,从而使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政治改革时进时退,它也是西方指责伊朗政治不民主的重要目标。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的伊斯兰基金会在革命后势力急剧膨胀,控制着伊朗经济的大部分产业,可以阻碍政府的任何经济改革。而且他们还利用与领袖的密切关系对国家政治经济决策施加压力。另外,这些基金会的出现始于革命目的,其政策倾向具有浓厚的革命色彩,在对外政策上的主张相对较为保守,基金会凭借强大的财力对伊斯兰世界激进势力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伊朗的国际信誉,影响到务实政府在外交上的努力。

2. 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在教育上的主张,对革命后初期伊朗的文化和科学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霍梅尼关于伊斯兰教育的思想,在革命后表现为教育领域的全面伊斯兰化,尤其是在高校。1980 年 3 月 21 日,霍梅尼要求大学伊斯兰化。1980 年 5 月,霍梅尼下令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在高校大规模清洗“非伊斯兰分子”。1980 年 6 月,在霍梅尼倡导文化革命时期,还成立了大学运动组织(University Crusade),很多大学生成为该组织的重要成员。当局根据大学运动组织提供的信息,辞退了被认为受到诸如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等东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老师。文化革命委员会还重新设置课程,编写新的教材,用伊斯兰教知识去替代西方的观点,以此帮助教师们更好地去理解伊斯兰教。伊斯兰政府还试图在大学和神学院之间建立牢固的联系,霍梅尼曾明确指出应在德黑兰大学和库姆的首席神学院菲兹亚神学院之间建立特殊关系。同时政府还加强了对媒体的管制。在革命前,除了一些可能危害国家政权的书籍外,各种科学和文化类的报纸杂志都是开放的。革命后,许多书籍报纸的进口要么被取消要么被降到最低限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媒体的多元化发展。

霍梅尼在教育上的主张和全面伊斯兰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伊朗知识分子的流失。这些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前巴列维王朝培养出来的,为配合伊朗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改革,很多学生被派往国外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1977-1978 年,伊朗在外留学的人数为 100,000,其中在美国注册的有 36,220 人,其他的主要在英国、西德、法国和澳大利亚。^①1979 年革命后,新建立的伊斯兰政权及其对知识分子的消极政策,不仅将那些在大学任教的教授们清出学校,也使那些尚在国外的伊朗知识分子不敢回国。而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接受过西方教育,对社会政治发展有自己的看法,能够对时局和社会发展趋势做出独立判断,在偏离伊朗主流社会政治圈后,有些流亡国外,有些在国内成为伊朗政治反对派的领袖人物,成为伊朗民主政治理论的建构者和宣传者。

3. 霍梅尼革命留给伊朗最大的政治遗产是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建国理念,但这一政治遗产本身也给伊朗带来了巨大的争论。如何在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宪法原则中体现和实践伊斯兰和共和两大因素,使其并行不悖,成为伴随伊朗国家发展的最大问题,也是伊朗国内派系斗争的理论源头之一。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强调教法学家在治理国家中的领导权,并希望通过立法来实现这种领导权的体制化。当时,大多数人赞同并支持伊斯兰革命和建立伊斯兰政权,但对于教法学家治国的理念,伊朗国内存在争论。持反对意见的代表人物是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他

^① Akbar E. Torbat, "The Brain Drain from Iran to the United States", *Middle East Journal*. 2002, 56 (2), pp. 276-284.

说，在伊斯兰教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乌莱玛必须干预国家事务，只有两条例外：国会立法与沙里亚法相矛盾时，或者是领导人不能建立社会秩序时。对于霍梅尼主张不相信乌莱玛政治领导的人是革命敌人的说法，沙里亚特马达里指出“治理国家是政府的事情，精神领袖不应当直接干预。”^①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始终认为，国家的最终主权在于伊朗人民，因此他反对伊朗宪法中的第 110 条，因为这一条款赋予领袖的权力太多，使“我们看上去从一个专制换到了另一个专制”。在全民投票的前一天，沙里亚特马达里发表了一篇声明，首先他指出宪法是可以接受的，而后他又指出宪法第 110 条赋予领袖的一系列权力与第 56 条真主赐予人民主权之间存在严重分歧。

教法学家权威统治在争论中被写入了宪法，尽管霍梅尼建立伊斯兰政府的政治主张规定了国家发展的大方向，但在革命胜利后初期，他对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政策的细节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霍梅尼的追随者对此产生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伊斯兰政权建立后伊朗派系之争的开始。围绕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争论主要发生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在支持法基赫原则的一方中，伊斯兰共和党秘书长贝赫希提认为“人民已经投票支持伊斯兰共和国，因此对于政权只在名字上保留伊斯兰是不够的”，“教法学家加入治国序列是唯一的方法可以确保未来这个国家不会变成共产主义或是社会主义。”哈梅内伊则对主张人民主权至高无上的西方民主模式进行了批判，认为“建立在伊斯兰教原则之上的主权属于真主，真主将这些权力委托给了人民，因此人民应当选举教士作为代表。”拉巴尼·阿姆拉沙说，“如果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没有法基赫的位置，我们怎么能称之为伊斯兰宪法呢？”^②另一方则表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从政权性质上应当既具有伊斯兰性，也具有共和的性质，因此政权的共和主义性质如果不能比宗教地位重要至少应该平等。穆萨维·雅扎耶里指出“这个政权就像其名字显示的一样，由共和和伊斯兰组成。共和意味着它属于人民。如果什么事情都是由教法学家来决定，这怎么是人民主义呢？人民在这个体系中又扮演什么角色呢？共和和伊斯兰加在一起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宣称，这个体系既是神圣的也是人民的，但我们怎么能说它是共和的呢？”^③

由于伊朗建立的是政治与宗教高度合一的伊斯兰政权，最高领袖与行政首脑总统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制度关系问题，他们之间关系的定性决定着未来伊朗政治发展的体制框架，因而也成为争论的焦点。在宗教领袖与总统的关系上，这种争论尤其表现在霍梅尼的原定继承人蒙塔泽里和总统萨德尔之间。蒙塔泽里提出，“从定义上看，伊斯兰共和国必须实践伊斯兰法令……只有精通伊斯兰教法的专家而不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才能辨别法律的伊斯兰性。”他说：“法基赫应当有权选择总统候选人，然后人们可以从中选择他们支持的候选人。”“这个程序意味着人民可以民主选举他们的总统。”对于蒙塔泽里的观点，萨德尔反驳说，“如果领袖能够决定谁应当竞选总统，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选举，总统又是干什么的？这等于说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候选人，但必须在我指定的候选人中选，这既不是自由，也不是共和主义。”他提出，“任何在司法程序之外和与政府平行做出的决定都等于专制”。^④

四、余 论

马克·道恩斯在《伊朗未完成的革命》中提出，“革命应当被看成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

① Dilip Hiro, *Iran under the Ayatollahs*, London, Melbourne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 p. 117.

② Mehdi Moslem, *Factional Politics in Post-Khomeini Iran*.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4 - 29.

③ Ibid, pp. 25 - 27.

④ 同上, pp. 24 - 29.

一个当时发生的时间’，“革命是一定社会政治结构内部重新分配权力的手段”，他强调对伊朗革命意识及精神的研究。^①然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已经过去了 30 多年，其间伊朗国内政治出现过革新也出现过回流，但神权政治的体制框架毅然耸立，其主要原因在于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在伊朗建国理念的体现与实践。因此，要研究当代伊朗必须溯源到 1979 年的霍梅尼革命，要理解纷乱复杂的伊朗内政外交，需要了解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思想及其影响。从理论上讲，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思想是一个封闭性政治学说，其封闭性表现在他试图在拒绝外来影响下向外界显示其独立性和唯一性，例如其“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不要宪法、不要法律、只要《古兰经》”的政治主张。与此同时，霍梅尼的思想是在伊朗反对君主专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并形成的，因此，可以说它是伊朗面临内忧外患下寻求国家发展道路的一种尝试，而宗教则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责任编辑: 李建欣)

^① Mark Downes, *Iran's Unresolved Revolution*.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2, p. 48.

Abstracts of the Major Articles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of Dong Shan Kou District in the Eastern Suburban of Guangzhou City

Ye Nong

Geography of Religions is a branch of learning of the Human Geography. It researches the religions' affection into the urban development, etc. This article takes use of the archives being stored in the Guangdong Province's Archives Museum and related materials, field investigation, to study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Baptist Churches and urban development of Dong Shan Kou District in Guangzhou City. They include the Church buildings and preaching; establishment of educational, publishing and charity institutes; the development of Dong Shan Kou District.

The formation of worship of God of Water and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Wang Yuanlin and Guo Xuefei

Worship of Xiao Gong came into being in Dayangzhou, Xinjan of Jiangxi province and became prevalen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temples where people worship were widespread all over the nation. The formation of worship of Xiao Gong during the history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clan of family whose surnames are Xiao. In the Ming dynasty, more titles were conferred on him twice by the nation because of his contribution in the regional areas as well as the whole nation, thus making him become the orthodoxy spirit. Xiao Gong's status was raised increasingly, his influence becoming stronger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ship of Xiao Gong began to become widespread and the geographical areas where it spread became broader, finally making him a God of Water that the public honored in rivers and lakes.

Review on the Study of Tablighī Jamā 'at

Ma Qiang

Tablighī Jamā 'at, namely which is the strongest transnational Islamic preaching movement in the world, spreads in many countries with loose organizations and the mobility of adherents. Academically, scholars in different subjects, such as history, comparative religions, political scienc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studied its origins, emerging background, leaders, theology, organization, membership, preaching activities, using texts, localization, relations with politics, social impact, and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states and areas, etc. Most of the researchers are westerners whereas some of their conclusions still deserved to be discussed in details. The contemporary studying difficulties lie in three aspects as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resources and languages. The studying perspectives and scopes are still limited, among which shorting of profound case exploration through fieldwork and adequate academic attentions on its localization contextually of different areas. And studying ethnics and value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simultaneously.

Theory of Khomeini's Islamic Revolution

Jiang Zhen

Theory of Khomeini's Islamic Revolution resulted from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anti-monarchy, anti-imperialism, anti-colonialism, which embodied his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igion and state, the status of the jurists, and the model of the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Building the Islamic government, reforming the Islamic education, and exporting the Islamic revolution supported by Khomeini, mad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Iran. The policy on the Islamic education resulted in a passive impacts on Iran's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science. The authority of the jurist provided a found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igion and state in Iran, and brought about the disputes as well.